

文献研究

《石室秘录》的学术特色

山东中医学院 张灿理

《石室秘录》为清·陈士铎编述，全书共六卷，载128法。阐述了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等100种左右疾病的证治，收古今成方及作者自定方500余首，其中大多处方，出于自裁。现仅就该书的学术特色约述如下。

一、结合临床实践，发挥《内经》理论

该书128法包括“正医法”、“反医法”、“全治法”、“偏治法”等，对《内经》理论颇多发挥。如上病治下，下病治上，中病傍取的问题，该书“偏治法”中对方药的运用，便体现了这一原则。提出“偏治者，乃一偏之治法。譬如人病心痛，不治心而偏治肝，譬如病在上而偏治下，譬如病在右而偏治左，譬如病在四肢手足而偏治其腹心也。”并具体指出心病治心包之法，上焦火而下治肾之法，左肝病而治右肺之法，厥在四肢而治在心腹之法。在脏腑生理方面也有许多见解，如“脏治法”中指出“脏有五，治法惟三，脾肺同一治，肾肝同一治，心肾同一治。”是对脏气相关理论的概括。在卷五“论五行”中提出“五行火木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，人尽知之也；然而生中有克，克中有生。”又如对不孕症问题，该书“论子嗣”中提出“男子不能生子有六病，女子不能生子有十病，对临床指导不孕症的治疗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如此等等，都是对《内经》理论的重要发挥。

二、辨证立方，多别具新义

如“反医法”中论狂病的证治，“此皆正气虚而邪气犯之也，似宜治邪为是，然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不治其虚，安问其余。此所以急宜固其正气，而少佐以祛痰祛邪之药为妙。如发狂见鬼者，乃虚也，方用人参一两(30克)、白术一两(30克)、半夏三钱(9克)、天南星三钱(9克)、附子一钱(3克)。水煎灌之狂自定矣。”又卷六“内伤门”治癫痫症之祛痰定癫汤，“狂症”之化狂丹，用药稍有差异，而立法原则是一致的。皆以补气药中少佐附子“引补心消痰之剂，直入心中，则气尤易补而痰尤易消。”吾常师此法，用于癫痫及狂

病之体弱而病缓者，每收良效。又如其治肺癰方用元参二两(60克)、麦冬三两(90克)、生甘草五钱(15克)、金银花十两(300克)。吾家自先祖先父以来，曾以此方加减化裁治愈多人。先祖尝云：大凡诸病用常法治疗无效时，可于《石室秘录》中检方一试。后吾在临诊时，遵守此训，获益良多。

在用药方面，该书亦有独到之处，如对白芥子的应用，可见一斑，诸如在治痰方、治狂方、治木克土方、治梦遗方、治喘嗽方、治虚劳方、治厥方、治夜间发热方、治风痺方中均有白芥子。考其立义，皆着眼于祛痰通络。先父亦常语吾云：凡顽麻肿硬，若非死血，即是湿痰，又诸多怪症，亦多责之痰。证之临床，确多如是。

三、用药量大效专

书中自定诸方，多为味少量大，味少则可减低制约之力量，大则可奏擅专之效。如“正医法”中治肺癰方，金银花用至十两(300克)，发挥其清热解毒之力，使肺金得清，则痈脓得除；治血痢方当归用至一两(30克)，正合“调血则脓血自愈”的原则。“逆医法”中治喘症方人参用至一两(30克)，麦冬用至二两(60克)，配以五味、牛膝、胡桃、生姜汁，此于肺肾两虚之喘，用之颇当。正如文中所云：“喘病虽是肾虚，毕竟肺虚不能生肾水，肾水不能速生，必须补气以生之。”故其重用麦冬、人参，以专其力。又治腰痛用白术三两(90克)、芡实二两(60克)、薏仁三两(90克)。此方祛湿之力甚专，为治寒湿腰痛之良方。又如卷六“痈疽并无名肿毒”方，用金银花四两(120克)、蒲公英一两(30克)、当归三两(90克)、元参一两(30克)，昔日曾用之多人，亦能应手。书中用药，常常强调单刀直入之法，此等味少量大之方即取其义，对一些危重证之治疗，可以取法。

四、重视综合治疗

该书的治法以药物治疗法为主，但也多用综合治法。

如卷一“逆治法”中，治喉病双蛾，少阴之火上奔，喉门肿痛，茶水一滴不能下咽者，愈用寒凉药则病愈甚，“急须刺其少商之穴出血少许，喉门必有一线之路开矣。”再以附子、熟地、山萸、麦冬等煎服。此乃先以针刺治其标，后以汤药治其本之法。又如卷一“碎治法”中，载有割瘤接舌之法，并载有麻药方一首及外敷药方。另外还有卷三“摩治法”中，治手足疼痛、颈项强直等用按摩法，“浴治法”中，治疥癩等病用洗浴之法等等。

此外，在“论气血”中又对气血先后缓急之治，提出了重要的论述。其谓“气，无形也；血，有形也。人知治血必须理气，使无形生有形，殊不知治气必须理血，使有形生无形也。但无形生有形，每在于仓皇急危之日，而有形生无形，要在平常安适之时。人见

用气分之药，速于见功，用血分之药，难于奏效，遂信无形能生有形，而疑有形能生无形。不知气血原叠相生长，但止有缓急之殊耳。”纵观全书，对许多疾病的治疗，确实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。如治癲狂用参术重至两许，补正以祛邪；喉蛾假热用附子、熟地、山萸、麦冬、五味、牛膝、茯苓等，引火归原；吐血血崩，先用参、芪，后用归、芍之法，就体现了这一精神。

当然，我们肯定《石室秘录》的学术成就是指正确的和有价值的部分，绝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。例如书中某些受道家玄学影响思想和故弄玄虚之处，也是不足取的。另外，书中凡称岐天师、电公、华公（指华佗）、张公（指张仲景）等，乃有意托古。所以对该书的继承，当弃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不苛责古人。

《华佗尤候》是《华佗九候论》之误

安徽省立医院 尚启东

日人丹波元胤《中国医籍考》卷三十九方论十七列有《华佗尤候》一书，其下注是：“按右见于《幼幼新书》。”今检《幼幼新书》卷四十前代方书第十三列有《华佗尤候》，后文是：“后汉华佗撰，佗字元化，沛国谯人。”由此可知则宋人刘昉等著《幼幼新书》时，认为《华佗尤候》是华佗所著。然《华佗尤候》的名称，很难加以解释。

《七录》、《隋书经籍志》、《新、旧唐书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宋史艺文志》、《通志艺文略》、《玉海》等书中，都没有《华佗尤候》一书的目录。林亿等校正《千金方·序》和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所引的各家医书目中，也没有《华佗尤候》之名。查《幼幼新书》卷三病证形候第八中列有《华佗九候论》，即是：“慢脾”、“慢惊”、“脾困”、“虚积”、“急惊”、“伤寒”、“天钩”、“斑疹”、“杂病”九种论小儿病候、脉证及歌诀。由此说明，《幼幼新书》卷四十前代方书第十三所列的《华佗尤候》，是《华佗九候论》之误。盖因湖南帅刘昉，命王历、王湜等，萃集古今诸方书中的小儿方剂之说为四十卷，目曰《幼幼新书》，但编到三十八卷时，刘昉因病去世，继任楼璩续修此书，并将其末的二卷合为一卷，复纂历所求子方论为一卷，冠其首，阅月而书成。这《幼

幼新书》当是仓促续成，疏于校对，因而出现了这一讹误。

《华佗九候论》既没有被各目录书所引，又不在其他各家所引的医书之中，且又是论小儿病候中的一部份，则其应该是一篇之名，不是一书之名。其中“斑疹候”有疹、有麻、有痘，而痘疹的起源，始于东晋，（参见陈邦贤《中国医学史》314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54）所以，《华佗九候论》不能出东晋以前。

又《肘后方》卷二云：“比岁有病时行，仍发疮，头面及身须臾周匝，状如火疮，皆戴白浆，随决随生，不即治，剧者多死，治得差后，疮瘢紫黑，弥岁方减，此恶毒之气。”“以建武中，于南阳击虏所得，乃呼为虏疮。”按《肘后方》所说，即是痘疮也，是一时的流行传染，并不是指小儿的疾病。《张文仲方》有“永徽四年，此疮从西域东流于海内”之记载，也是一时的流行传染，也不是限于小儿的。到了《太平圣惠方》时，才将痘疮列于小儿病中。

又古时只有阴痢，阳痢之病，没有慢惊、急惊的病名，慢惊、急惊的病名，亦是《太平圣惠方》所称，由此可知，《华佗九候论》是托名华佗的

（尚煦整理）